

《琵琶记》研讨会
论文集

温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编

目 录

温州与温州戏曲(代序)	邵占维(1)
20世纪《琵琶记》文献研究述略	苗怀明(1)
《琵琶记》对后世戏曲的影响	金宁芬(19)
病梅:《琵琶记》蔡伯喈形象的文化人格	郭英德(34)
名家递藏的《新刊巾箱蔡伯喈琵琶记》	刘效民(50)
《琵琶记》与古代曲论的几个重要命题	赵山林(65)
对名分的质疑和批评	
——从身体角度看《琵琶记》的思想意义 ..	金英淑(79)
《琵琶记》的情与理	吕文丽(94)
《琵琶记》情节纰漏成因探析	徐大军(101)
陈继儒批评《琵琶记》版本流变及其真伪辨正 ..	孙书磊(115)
从娱人到自娱的分流	俞为民(127)
《琵琶记》的后续剧作	江巨荣(141)
《琵琶记》的性情与教化	司徒秀英(155)
《琵琶记》的艺术特色	胡雪冈(164)
陆钞本《琵琶记》“开场”质疑	侯百朋(172)
“南戏”名称考略	
——以“南戏之祖”为切入点	徐顺平(180)
古本《琵琶记》说略	孙崇涛(194)
高则诚《琵琶记》遗存考	徐宏图(205)

《闵子骞单衣记》遗存考	徐宏图(237)
董每戡《琵琶记》研究述论	马必胜(251)
赵五娘的贤德新解	谢雍君(263)
蔡伯喈疑案	沈不沉(279)
试论高则诚的戏剧观及其意义	黄爱华(294)
浅谈高则诚改编《琵琶记》的初衷	李 淳(305)
附录	
《琵琶记》的译本	佚 名(311)
高则诚与《琵琶记》研究论文索引	汉 江(313)
温州南戏的三次学术会议	北 城(318)
留美学生公演话剧《琵琶记》	张 益(321)
南戏故里论《琵琶》	徐宏图(326)
后记	沈不沉(329)

温州与温州戏曲(代序)

邵占维

温州是新时期最初对外开放的 14 个城市之一,通过近 30 年的发展,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

温州市辖 3 区 2 市 6 县,总人口 777 万,其中市区人口 200 万,是浙江省三大中心城市之一。温州城区依山傍水,临江面海,城在水中,山在城中,兼具山的奇秀、水的柔美和海的神韵。温州的风景资源得天独厚,有雁荡山、楠溪江、百丈漈飞云湖三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有乌岩岭原始森林、南麂岛海洋生物两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还有被称为“百岛之县”的洞头县等,旅游景区面积约占全市面积的四分之一。

温州是一座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城市,是我国民营经济的发源地,创造了具有鲜明特色的经济格局,是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认定的全球最具活力城市之一,也是“中国十大最具经济活力城市”。目前已建成“中国鞋都”、“中国电器之都”等 32 个“国”字号生产基地;拥有 64 个中国驰名商标和中国名牌产品。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的商品广告中,有 10 余个品牌是全国知名的温州产品。

温州从东晋太宁元年开始建城,至今已有 1684 年历史。温州的文化底蕴十分深厚,它是中国山水诗的发祥地,我国山水诗的鼻祖谢灵运在永嘉太守任上写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山水诗;宋代诗歌界的“永嘉四灵”诗派,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温

州是中国戏剧的发祥地,宋室南渡时出现的南戏,就产生在我们脚下这块土地上;高则诚的《琵琶记》被誉为中国戏曲史上的一颗明珠;永嘉昆剧已被列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南宋时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提出事功学说,主张“通商惠工”、“义利并举”,影响极为深远。温州是中国数学家的摇篮,近百年来,数学界的温州籍教授有200多位,其中苏步青、谷超豪等一大批数学家饮誉中外。此外,温州还有许多令人刮目相看的称号,如“歌舞之乡”、“游泳之乡”、“国际象棋城”等等。

温州人“敢为天下先”,具有恋乡不守土、重利不守财、吃苦不叫苦的禀性。曾经涌现出“胆大包天”、“胆大包地”、“胆大包海”、“胆大包江”等一大批典型人物。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温州人;哪里有温州人,哪里就有市场。温州人素有吃苦精神,“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是温州人艰苦创业的真实写照。

随着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入,城市文化建设的呼声越来越高,中共温州市委两年前就已提出建设文化大市的设想。我们提出把“戏曲故里”作为温州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品牌,首先着眼于温州民间深厚的戏曲文化积淀,其次是更好地培育与引导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就已经形成的戏曲市场,直面当今的“戏曲危机”,温州“戏曲故里”的某些举动,也许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从戏曲发展的历程来看,温州的戏曲品种在浙江省乃至在全国,恐怕是最多的,晚清以来就有高腔、昆曲、乱弹、和调,后来又增加了京剧与越剧,曾经一度流行的马灯戏与河北梆子还没有算在内。温州的戏曲工作者为京剧与越剧的培育与成长,都曾作出过杰出的贡献。比如,中国第一个京剧科班“富连成”1904年出现在北京,中国第二个京剧科班“尚武台”1909年出现在温州;中国第一部京剧曲谱是瑞安人郑剑西编辑的《二黄寻声谱》(1920年大东书局出版,工尺谱);中国第二部京剧曲谱是瑞安人陈小鲁编辑的《皮黄琴谱》(1931年开明书局出版,简谱);中国第一个昆曲

科班“昆曲传习所”1923年出现在苏州,中国第二个昆曲科班“江南春”1935年出现在平阳。温州是越剧早期流行地域之一,著名演员陆杏花、赵瑞花、姚水娟等都曾先后来温州献艺,1935年冬,温州报刊就曾出现过“越剧”的名称。

二、温州戏曲的繁荣,催生了一支具有相当实力的创作队伍。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温州剧作家、演员创作与演出了许多堪称一流的剧目,获得过许多奖项。如尤文贵、张思聪、张烈、郑朝阳、施小琴等,都是全国闻名的顶尖编剧。一些国家级的奖项如“戏曲学会奖”、“曹禺文学奖”、“梅花奖”、“文华奖”等等,都曾经落户温州。

三、当全国的文艺团体都在为戏曲危机而忧虑的时候,温州却是“风景这边独好”,虽然城市的戏曲观众日渐减少,但温州农村的戏剧演出却是一片兴旺的景象。从1985年以来,温州广大的农村就存在一个全国唯一的戏曲市场。据统计,温州除了5个国营剧团外,还有60多个职业与半职业剧团,他们不拿国家一分钱,但演出场次却远远高于其他地方的国营剧团,全国各地的许多一级、二级著名演员慕名而来,先后在温州搭班演出,在本地落户的戏曲演员数以百计。这种情况在全国其他各地都是罕见的。

现代社会是一种多元化的文化结构,对外来文化的兼收并蓄也应该在情理之中。问题在于当代的许多年轻人对民族的优秀文化所知越来越少,距离越来越远,尤其是戏曲的观众的流失率逐年增加。我们打造“戏曲故里”的真正目的,从根本上说,就是为了弘扬民族文化。我们的理念很明确,我们需要外来文化,但决不会以牺牲本民族优秀文化作为代价!

最近温州举办的“纪念高则诚诞辰700周年暨《琵琶记》学术研讨会”,仅仅只是为打造“戏曲故里”迈出的一小步,前面的路还很长,但我们一定会坚持走下去。

20 世纪《琵琶记》文献研究述略

苗怀明

作为一部戏曲史上影响深远的经典之作,《琵琶记》自问世以来一直受到人们较多的关注。进入二十世纪后,现代戏曲研究学科建立,《琵琶记》依然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对它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就,其中文献方面的研究尤为值得关注。它既是整个《琵琶记》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研究的整体水准,因此有必要给予归纳和总结,为更为深入的研究提供借鉴。这里依据相关资料,按照时间顺序对二十世纪以来《琵琶记》文献研究的整体情况进行介绍,如有疏漏及不当之处,还请方家指正。

—

20 世纪上半期是《琵琶记》文献研究的第一个阶段,也是初创阶段。此前已有人出于兴趣和爱好,注意搜罗《琵琶记》的重要版本,或进行改写、评点、校勘,比如明人河间长君曾搜罗各种《琵琶记》版本多达四十多种,清人陆貽典据元本校录《琵琶记》等。不过,真正出于学术自觉进行研究却是进入二十世纪之后。几十年间,在研究者的努力下,《琵琶记》文献研究取得不少成就。以下

分几个方面对这一时期《琵琶记》文献研究的情况分别进行介绍：

1. 文献资料的新发现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戏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逐渐确立,并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一些有志之士开始致力于这一领域的研究,他们或寻访,或购藏,或披览旧籍,以各种形式搜罗戏曲文献,有不少新的重要发现,如《元刊杂剧三十种》、《永乐大典戏文三种》、《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车王府唱本等,因此这一时期也是戏曲文献的一个大发现时期。在此较为有利的环境下,《琵琶记》文献也有一些新的发现。

1908年王国维编制《曲录》时,只见到并著录一种《六十种曲》本,由此可见当时相关文献的缺乏。此后几十年间,经研究者的努力搜求,情况大为改观。一些藏书机构及学人、藏书家得以购藏不少重要的《琵琶记》版本。截止到1934年,北平图书馆藏有六种珍贵的版本,其中有四种为甲种善本^①。私人方面,郑振铎仅抗战期间就购藏有明末刊本《新刻魏仲雪先生评点琵琶记》、明万历陈大来刊本《重刊河间长君校本琵琶记》^②。此外,他还收藏有明容与堂刻本《李卓吾批评琵琶记》、明凌氏朱墨刻本《琵琶记》等重要刊本^③。马廉藏有新刊巾箱《蔡伯喈琵琶记》、明刊本《新刊重订出相附释标注琵琶记》、清陈方平三多斋刊本《绘图亭评第七才子书琵琶记》等三种珍贵刊本^④。藏书家周越然也购藏或得

^① 参见《国立北平图书馆戏曲音乐展览会目录》第2—3页,1934年刊行。

^② 参见郑振铎《劫中得书记》,载《郑振铎文集》第七卷第460、48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

^③ 参见郑振铎《西谛所藏善本戏曲题识》,载《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100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④ 参见《不登大雅文库书目》,载《马隅卿小说戏曲论集》第379、383、386页,中华书局2006年版。

见如下一些重要版本：影印元刊本《新刊巾箱蔡伯喈琵琶记》、云林别墅重刻《元本大版释义全像音释琵琶记》、明吴兴凌氏朱墨套印本《琵琶记》、明虎林容与堂刊《李卓吾批评琵琶记》、《六十种曲》本《琵琶记》、清康熙中刻《绘风亭评第七才子书琵琶记》、三多斋刊《绘风亭评第七才子书》、金闾书业堂刻巾箱本《成裕堂绘像第七才子书琵琶记》^①。

中国本土之外，藏在域外的重要《琵琶记》文献也时有发现，特别是日本，截止到 1926 年，中国学人所知日本所藏明代《琵琶记》刊本就有三种，即藏于内阁文库、篷左文库的重校《琵琶记》、藏于静嘉堂文库的元本出相《南琵琶记》及藏于内阁文库的凌氏朱墨套印《琵琶记》^②。

《风月锦囊》本《琵琶记》也是这一时期的一个重要发现。1929 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在其《关于西班牙所藏几种典籍的札记》一文中披露，西班牙埃斯科里亚尔图书馆藏有一种明代刊本《新刊耀目冠场擢奇风月锦囊正杂两科全集》，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风月锦囊》^③，它是现存最早的一部明代戏曲选本，其中收录有《新刊摘汇奇妙戏式全家锦囊伯皆》一卷，该本文字介于元本与明改本之间，对研究《琵琶记》的流传及校勘整理具有重要价值。该书的发现，使人们得见的《琵琶记》重要版本又增加了一种。

1934 年，戴望舒到西班牙旅行，也见到此书，并作了如下的介绍：“系天壤间孤本，所选传奇、杂剧、时曲甚富。时曲无论，传奇、杂剧亦颇多今已失传者，虽系选本，且仅录曲文而无宾白，然亦弥

① 周越然《〈西厢〉与〈琵琶〉》，载其《书与回忆》第 151—153 页，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另参见其《〈琵琶记〉之版本》，载其《言言斋古籍丛谈》，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

② 参见《日本现存中国小说戏曲目》，载《马隅卿小说戏曲论集》第 355 页，中华书局 2006 年版。

③ 参见孙崇涛《风月锦囊考释》第 265 页，中华书局 2000 年版。

觉可珍。”他当时曾抄了一份目录,拍摄一些书影,准备回国后将全书影印,“终以摄影索价过昂未果”^①。国内学人是通过戴望舒的介绍得知此书消息的,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人们见到此书的照片进行研究,已经是十数年之后了,至于将其整理出版,则要更晚了。

2. 作品的整理出版

这一时期,一些精通版本的刻书家出于个人兴趣,影印重刊了几种《琵琶记》的重要版本,其中主要有如下几种:

一是董康诵芬室影印重刊的《新刊巾箱蔡伯喈琵琶记》,该书以清黄丕烈士礼居所藏元刊本(即清陆贻典抄本)为底本,卷首插图则配以明凌氏刻本《琵琶记》^②。

一是刘世珩所刻暖红室《汇刻传奇》本《琵琶记》。该书汇集明刊本《陈眉公批评琵琶记》、吴梅《琵琶记札记》、明新安汪氏阮虎轩所刊《琵琶记》全目及插图等,内容较为丰富。

一是民国初年王季烈蟬隐庐影印的《凌刻臞仙本琵琶记》,该书以明凌氏刻本为底本。

上述三种印刷较精,较好地保存了作品的原貌,有益于珍贵文献的保存和流传,可惜印量较小,流传未广,查阅使用起来实际上也并不方便。

这一时期还出版了一些《琵琶记》的整理本,如开明书店1935年出版的整理本《六十种曲》,其第一种即为《琵琶记》,该书由胡墨林断句,叶圣陶、徐调孚校订,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流传也较为广泛。

^① 戴望舒《西班牙爱斯高里亚尔静院所藏中国小说、戏曲》,载其《小说戏曲论集》第67、68页,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

^② 相关情况参见郑振铎《元刊本(?)琵琶记》,载其《郑振铎文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

此外尚有何铭标点的《琵琶记》(上海新文化书社 1931 年版)、胡协寅校勘的《琵琶记》(上海广益书局 1932 年版)、朱益明标点的《琵琶记》(上海大达图书供应社 1934 年版)等。这些整理本多以明代评本为底本,采取新式标点,保留原有的评语,对《琵琶记》的流行和传播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3. 研究资料的搜集整理

这一时期较早注意搜集《琵琶记》文献的当数王国维。他在 1908 年编制的《曲录》一书中,征引《尧山堂外纪》、《静志居诗话》、《艺苑卮言》、《青溪暇笔》、《少室山房笔丛》等典籍,对高则诚与高棅是否为一入、《琵琶记》的本事等问题进行辨析^①。后又在《宋元戏曲考》一书中据《留青日札》、《列朝诗集》等书所载加以充实^②,对《琵琶记》文献进行了初步的梳理。

钱静方 1916 年出版的《小说丛考》一书中收有《琵琶记传奇考》一文。该文从《闲中今古录》、《后汉书》、《坚瓠集》、《玉泉子》中搜集资料多则,对高则诚的生平及《琵琶记》的本事等进行考述^③。

稍后,蒋瑞藻在其《小说考证》、《小说枝谈》两书中从《闲中今古记》、《浪迹丛谈》、《小浮梅闲话》、《顾曲杂言》、《两般秋雨庵随笔》、《艺苑卮言》等典籍中搜录相关资料近二十则^④,为相关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同一时期的姚华在其《菘菹室曲话》一书中对高则诚的生平、

① 王国维《曲录》卷四,载《王国维遗书》第十六册,上海古籍书店 1983 年版。

② 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之十四《南戏之渊源及时代》,载《王国维戏曲论文集》第 98—99、101 页,中国戏剧出版社 1984 年版。

③ 参见钱静方《小说丛考》第 33—35 页,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 年版。

④ 参见蒋瑞藻《小说考证》第 22—25、527—528 页,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 年版;《小说枝谈》第 28—48 页,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8 年版。

《琵琶记》的本事等进行考辨,并引证了不少材料加以说明,为学界提供了不少新资料。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在该书中,姚华还用相当多的篇幅,用《南九宫谱》所载《琵琶记》曲文来校汲古阁本,态度严谨认真,开二十世纪《琵琶记》校勘整理之先河。^①

高则诚生前曾著有《柔克斋集》二十卷,可惜至明代中叶即已失传,因此寻找其生平资料、辑录其佚作,便成为《琵琶记》文献研究的一个重要工作。民国初年,冒广生从明清各类典籍中搜寻,辑成《柔克斋诗辑》一卷,共得诗作 49 首、词 1 首,并将该书收入其 1915 年刊刻的《永嘉诗人祠堂丛刻》中。此外,他还辑得高则诚佚文十篇,“于元代大戏曲家高则诚之研究,则不失为一个较为集中和完善之刻本”。^②

这一时期还发表了一些以作者、版本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文章,如钱南扬的《瑞安高则诚传》(《浙江通志馆馆刊》1 卷 3 期,1945 年)、《“琵琶记”作者高则诚传》(《大公报》1946 年 11 月)、傅惜华的《“琵琶记”脚色之扮象》(《大公报》1935 年 6 月 26、29 日)等。日本则有岩城秀夫的《琵琶记研究》(《中国语学》第 24 期,1949 年 2 月)等。

二

建国后至 70 年代末为《琵琶记》文献研究的第二个阶段。这一时期《琵琶记》因其特殊的题材内容而受到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形成一个学术热点。1956 年 6、7 月间,中国戏剧家协会发起组织对《琵琶记》的讨论,广泛邀请首都文艺、戏剧界人士

^① 参见姚华《菴猗室曲话》卷三,载《新曲苑》,中华书局 1940 年版。

^② 冒怀苏编著《冒鹤亭年谱》第 190 页,学林出版社 1998 年版。

及上海、广州等地的专家,先后举办六次讨论会和一次学术讲演会^①。这次活动引发了学界探讨《琵琶记》的广泛兴趣。在此推动下,《琵琶记》文献受到关注,取得了一些新进展。但由于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扰,研究者的学术潜力远未充分展现出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琵琶记》还作为“宣扬孔孟之道的黑标本”而受到批判^②,相关研究陷入停顿。

这一时期《琵琶记》文献研究的情况可以分成如下几个方面:

1. 文献资料的新发现

这一时期《琵琶记》文献的发现主要集中在版本方面,比如1958年11月,在广东揭阳县渔湖公社西寨村的一座明墓里出土了一种嘉靖时期的抄本《蔡伯皆》。全书五册,其中三册出土后毁损,现仅存两册,一册为总纲,一册为生本。这是“迄今所保存下来的时代最早的一种戏曲艺人舞台演出本”,从其内容文字来看,该书接近以陆貽典抄本为代表的元本,是“同属‘元本’范畴的一种珍本”^③,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文物》杂志1961年第1期刊载林曦的《广东揭阳明墓发现〈蔡伯喈〉戏曲抄本》一文,最早向学界披露了这一重要发现。由于受政治因素的干扰,这一发现在当时未能得到充分的重视,直到八十年代才得到较为深入的研究^④。

① 具体情况,参见剧本月刊社编辑《琵琶记讨论专刊》,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② 参见陈金铨、李德鹏《〈琵琶记〉是鼓吹“忠孝节义”的黑标本》(《贵州文艺》1975年第2期)、刘普林《〈琵琶记〉是儒家戏曲的反动标本》(《安徽师大学报》1975年第2期)、徐召勋《宣扬孔孟之道的黑标本——〈琵琶记〉批判》(《安徽文艺》1975年第3期)。

③ 以上刘念兹《嘉靖写本〈琵琶记〉校录后记》,《戏曲研究》第三辑,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④ 相关研究论文参见陈历明、林淳钧编《明本潮州戏文论文集》,香港艺苑出版社2001年版。

再比如这一时期赵景深托人买到一本绍兴高腔戏的抄本,其中有《琵琶记》六出,内容文字“与长沙湘剧高腔的《琵琶记》极为接近”^①。

专门收购、经营古籍的中国书店在建国后的三十年间仅明刊本《琵琶记》就收购到三种,即明万历刻本《重校元本大板释义全像音释琵琶记》、明起凤馆刻本《琵琶记》和明末书林刻本《陈眉公批评琵琶记》^②。

2. 作品的整理出版

这一时期有一些重要的《琵琶记》版本得到影印刊布,为深入研究提供了较大便利。如《古本戏曲丛刊》第一辑收录有郑振铎所藏明容与堂刻本《李卓吾批评琵琶记》、北京图书馆所藏清陆貽典钞校本《元本蔡伯喈琵琶记》。

1954年,文学古籍刊行社用开明书店纸型,重印《六十种曲》,并请吴晓铃根据明汲古阁初印本及其他明刊本进行校订,这种修订显然也包括《琵琶记》在内。1958年,中华书局又根据文学古籍刊行社本重印。

影印、重印之外,这一时期还出版了一些整理本,其中以钱南扬校注的《琵琶记》(中华书局1960年版)成就最高。

该书以清陆貽典抄本《新刊元本蔡伯喈琵琶记》为底本,校勘“用《巾箱本蔡伯喈琵琶记》(简称《巾箱本》),《李卓吾批评琵琶记》(简称《李评本》),《陈继儒评琵琶记》(简称《陈评本》),毛氏汲古阁本《琵琶记》(简称《毛本》)为主;凌氏朱墨本《琵琶记》(简称《凌本》),亦偶尔引及”。陆貽典抄本原不分出,为了便于读者

^① 赵景深《绍兴高腔〈琵琶记〉》,载其《戏曲笔谈》第157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② 参见《中国书店三十年所收善本书目》第236页,中国书店1982年编印。

的阅读,校注者分出段落,“每一段落之前加上一个数字”,“更为翻检便利,在目录每段之下,并注明剧情概况”。注解“以帮助读者理解剧中文字、典故、含义为主,不作烦琐的考据或引证”^①。书后附《高明小传》。

3. 研究资料的搜集整理

在高则诚的佚文整理方面,这一时期有柏繁标点整理的《柔克斋诗辑》(剧本月刊社编辑《琵琶记讨论专刊》,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6 年版)。该书根据《永嘉诗人词堂丛刻》本整理,“有数处间参考《瑞安诗征》本校正”^②,并出校勘记。此外整理者还补辑佚诗一首,附录高则诚佚文《乌宝传》。

这一时期还发表了一些以研究作者、版本为主的实证类文章,主要有戴不凡的《高则诚事略》(《文艺报》1956 年第 16 期)、胡雪冈的《〈琵琶记〉的作者高则诚》(《光明日报》1957 年 1 月 27 日)、赵景深的《蔡伯喈琵琶记》(载其《元明南戏考略》,作家出版社 1958 年版)、《琵琶记的用韵》(载其《读曲小记》,中华书局 1959 年版)、《谈明抄〈蔡伯喈〉》(《羊城晚报》1961 年 3 月 22 日)、湛之《高则诚的卒年》(《文史》第一辑,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等。

港台及海外这一时期也刊布了一些有关《琵琶记》文献研究的著述,论著有张棣华的《琵琶记考述》(台湾正中书局 1966 年版),论文则有日本学者足立原八束的《南曲琵琶记的演变点滴》(《专修大学论集》第 2 期,1952 年)、八木泽元的《琵琶记》(载《中国的名著》,1961 年)、台湾学者罗锦堂的《全家锦囊琵琶记:流落于西班牙文献之二》(《大陆杂志》13 卷 10 期,1956 年 11

^① 钱南扬《琵琶记》前言,中华书局 1960 年版。

^② 柏繁《柔克斋诗辑》附记,载剧本月刊社编辑《琵琶记讨论专刊》第 349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6 年版。

月)、《谈琵琶记》(载其《锦堂论曲》,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年版)、郑骞的《明斯干刊本琵琶记》(载其《景午丛编》,台北中华书局1972年版)等。

三

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政治文化氛围的宽松,随着学术研究的逐渐恢复,戏曲研究走上正规,《琵琶记》文献研究也由此进入一个新的良性发展阶段,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这一时期也是《琵琶记》文献研究的一个收获期。

以下对这一时期《琵琶记》文献研究各方面的情况分别进行介绍,需要说明的是,为了提供丰富、完整的学术信息,这里将21世纪前几年《琵琶记》文献研究的相关情况也放在这里加以介绍。

1. 文献资料的新发现

这一时期文献资料的新发现主要集中在高则诚生平资料及其佚作上。经研究者的努力搜求,从各种典籍中辑得一些珍贵的资料。如侯百朋在《高则诚文辑》一文中,“翻阅一些方志及其他书籍,辑得高文十二篇”,“这些资料,对了解高则诚和理解《琵琶记》不无帮助”^①。再如其《方志所见有关高则诚资料》一文,从明天顺《宁波府简要志》、明弘治、嘉靖、万历、清康熙、乾隆《温州府志》、明嘉靖、清乾隆、嘉庆《瑞安县志》、明嘉靖、清雍正《宁波府志》、清雍正《浙江通志》、清嘉庆《台州外书》、清光绪《处州府志》、清光绪《鄞县志》、清光绪《慈溪县志》等方志中辑得有关高则诚资料多则,“按年代先后排列,参照其它史料,稍加说明,对了解

^① 侯百朋《高则诚文辑》,《文献》第11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版。

这位剧作家的生平可能有些帮助”^①。“可能有些帮助”自然是谦虚的说法,在高则诚资料较为缺乏、人们对其了解不多的情况下,能发现如此多的材料,这对研究的深入进行,是有很大帮助的。此外,他还写有《新发现的有关高则诚的资料两件》(《浙江学刊》1984年第4期)等文披露自己的新发现。

2006年,徐永明发表《高则诚生平平行实新证》一文,披露明释来复所编的《澹游集》一书中收录有高则诚诗二首、文一篇、尺牍一通^②,这些都是研究者以往未看到的,为深入、准确了解高则诚的生平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2. 作品的整理出版

这一时期又有一些重要的《琵琶记》版本得到影印出版,其中主要有如下一些:

《暖红室汇刻琵琶记》,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0年线装影印出版。

《明本潮州戏文五种》,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影印出版。该书将五种珍贵的明本潮州戏文影印出版,其中就收有在广东揭阳出土的明嘉靖抄本《蔡伯皆》。

《全家锦囊伯皆》,载王秋桂主编《善本戏曲丛刊》,台湾学生书局1984、1987年影印出版。该书首次出版在西班牙发现的《风月锦囊》。《全家锦囊伯皆》的影印刊布,为研究利用带来了很大便利。

《明万历玩虎轩刻本琵琶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影印出版。

^① 侯百朋《方志所见有关高则诚资料》,《文献》第18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

^② 徐永明《高则诚生平平行实新证》,《文学遗产》2006年第2期。